

稿费,坚持认为这是创办一个有高学术水准的国际学术性刊物的必要条件。其理由是:既然国家给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笔研究经费,那么这一经费的使用,就不仅仅用来支持理论物理研究所内有关人员,而且应该适当回报到理论物理学界,其相关费用也理应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给予支持。何院士这一有关学术刊物的原则性主张得到理论物理研究所历届所长和副所长的完全支持。

还需要提到的是:理论物理研究所建所初期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的办公地点是今天的中关村一小对面的一幢二层简易小楼,其前身则是小松林里的几栋木板房。夏天因为楼板薄,太阳一晒,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冬天没有暖气,靠生蜂窝煤取暖。这个时候副所长何祚庥总要反复叮嘱同志们注意安全,防止火灾,防止煤气中毒。研究所的工作条件虽

然十分简陋,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却并不在意,纷纷到所访问和交流,称赞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重要研究机构。

何祚庥院士今年已是八十岁高龄。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到研究所工作。他每天上、下午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往返于黄庄小区与科学院基础园区之间。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先后提出要专门派小轿车接送他上下班,均被拒绝。理由是:中关村地区是最适合使用电动自行车上下班的地区,而且也能借此适当锻炼身体,锻炼大脑反应能力。

时光如梭!今年是何祚庥院士从事理论物理工作五十周年,也是何祚庥院士的八十岁寿辰,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继续为我国的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再工作20年!

一位为理想而奋斗的理论物理学家 ——祝贺何祚庥先生八十寿辰

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今年是何祚庥先生的80华诞之年。真难相信,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像小伙子一样来回驰骋于中关村住家与理论物理所的他,竟然已经80岁了。

何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分明,褒之者誉他为“科学斗士”;“反伪先锋”,贬之者则对他极为恼火,冠以种种令人难以启齿的“雅”号。我识何先生于四十多年之前,1986年之后又长期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交往也算密切,我视何先生是我的老师和朋友。面对人们对他“泾渭分明”的评价,我把与他长期接触的一些感受,在此写出,以为祝寿。

坚持原则,不怕批评

1964年底,我刚考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作研究生,就随同原子能所的几百名新分来的大学生和部分老同志远赴河南信阳专区参加“四清运动”和劳动锻炼,何祚庥同志正好和我编在一个中

队,是我们中队的副中队长,从此得以结识。其实,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和老何就见过一面。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秋天,老何到北京大学作报告,题目叫“物理学与数学的关系”¹⁾。他的报告很吸引人,能坐二、三百人的二教二零三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不过那次我只是一个听众,只能远远地听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对他挺佩服。

记得刚到信阳,就有半个月的集训,天天开会,学习文件,学习毛泽东选集,人人谈体会。那时候林彪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重版“毛主席语录”写了个“再版前言”,提出了一大堆口号,诸如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在讨论发言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林的“新鲜”提法都很拥护。不料老何对这些讲法唱反调,底下给我们泼冷水,说“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是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那里能‘立

[†] Email: jlx@itp.ac.cn

1) 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竿见影’?”。他不仅对我讲,也对别人讲。于是在中队党支部大会上,我向老何开了一炮,说他“思想不正确”;“打击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我的发言得到许多人包括支部书记的支持,纷纷批评他,要他检讨。记得老何那次没有检讨,也没有和我争论,只是表了个“以后说话要注意”的态。开会以后,老何拍拍我的肩膀,轻声说了句“小刘,太幼稚”,就转身走了。后来他约我在信阳专区的大操场散步,看见有个秋千架,先考了我一个物理问题“打秋千会不会打翻过去?”大概我回答对了,他表扬了我几句。关于我批评他的事,他没有再提,只是提醒我,以后回所跟着导师学习时,不要随便批评老师。我年轻气盛,觉得他说的不对,但也没有反驳。之后我们就分开去罗山县搞“四清”去了。

1965年春末“四清”结束后又在信阳集中。小组搞四清工作总结时,有人批评我和杜东生“不尊重地方干部”,起因是我和杜东生在不同的工作组都和四清工作队的地方干部“闹过矛盾”,因为我们在四清结束“解放干部”时,根据群众意见,把当初挨整的个别确实是好干部的“四不清干部”发展入了党,引起当时把他们定为“四不清干部”的人的不满。他听说后又拍了一次我的肩膀,说“小刘,看不出你们还挺讲政策!”显然在表扬我们。之后我们去信阳县东双河公社劳动锻炼,和老何并不在一个村。但和他同村劳动的熟人告诉我,老何劳动不积极,经常不下地干活,呆在屋里写文章。我于是在支部会上,又向他开了一炮,说他“下放劳动态度不端正”,“中队干部不起模范作用”。这次他没有拍肩膀,只是说了句“好,我注意。”算是接受批评。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老何邀请我去他劳动的村里“玩一玩”,说“有好东西给你看”。我如约而至。一进他住的屋子,他就从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叠稿子叫我读。稿子写的整整齐齐,读文字并不困难。我囫圇吞枣的看了一遍,觉得道理讲的不错,语言也通俗易懂。从这篇稿子里第一次知道了“基本粒子不基本”,“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论观点于基本粒子研究”这些概念。老何看我读得有兴趣,笑嘻嘻地问:“你看我是光下地干活好,还是也写点文章好?”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将我的军,不过这回认了输,说“写点文章好。”虽然还是硬撑着没有公开声明收回对他的批评,看得出老何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老何给我看的这篇稿子后来也发表了²⁾,标题很长,好像叫“关于阪田昌一‘基本粒子的对话’的对话”,署名的作者是何祚庥和庆承瑞。

1965年10月我们回到北京,他在中关村一部,我在坨里二部,基本没有来往,只是听说他积极参加由朱洪元、胡宁二位先生主持的“层子模型”研究,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取得了不少新结果。

林彪“913”在温都尔罕“折戟沉沙”之后的1972年的一天,突然有高能所“专案组”的两个人到七机部207所找我调查何祚庥的问题。他们一开始捧了我一番,说我在信阳“敢于和错误思想作斗争”。然后提出问题两个:何祚庥是不是反对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何祚庥是不是反对把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用于基本粒子研究?我把上面的故事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越听越没劲,既没有叫我写材料,也没有叫我在他们的调查纪录上签字,就打道回府了。那个星期六我回家,正好看见老何和庆承瑞先生在中关村大马路上散步,老何情绪不高。我急匆匆告诉他们:“高能所专案组找我调查老何来了!”老何有点紧张,忙问详情。听我讲完,他情绪大变,说:“你刘寄星还挺实事求是嘛!”庆先生告诉我,有人诬告老何“反对把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用于基本粒子研究”,何先生被专案组“日托”了,白天在所里“交代问题”,晚上才许回家。看来我给专案组外调说的情况对老何有利,怪不得他们不感兴趣。后来,听说是吴有训先生向军管会仗义执言,为老何辩冤,才把他放了。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

1986年我回到理论物理所,和何祚庥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多了。我常向他请教,他也常来办公室找我谈话。我们还是常有争论,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刚在大会上吵过架,不到10分钟他又敲门找我商量事。从那时到现在,老何作过许多事情,大多数我都支持,当然也有几件我不同意。其中有两件事我特别佩服他,一件是他亲自促成对李富斌剽窃事件的公开揭露,另一件是他公开和“法轮功”宣战。

头一件事发生在1992年秋天。那年我接到郝柏林同志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说徐州矿业大学的教师李富斌把外国人在《瑞士物理学报》发表的

2) 这篇文章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

3) 参见郝柏林“关于一起剽窃事件致《中国科学报编者》的信”(刊于该报1993年1月13日第二版)。

4) 黄祖洽:“一个值得我们注意警惕的问题”,《物理学报》,1993, A2: 170

一篇论文原文照抄,把作者改成他,又投到美国的《数学物理》杂志发表了,已被揭露。他请我查一下我们所办的《理论物理通讯》是否登过此人的文章,并将此事转告《物理学报》,另外他委托我把他揭露此事的另一封信寄给《中国科学报》³⁾,请他们公开刊登。两件事我都办了。李确实给《理论物理通讯》多次投稿,但由于刊物责任编辑程希友同志严格把关,怀疑李的“高水平”,把他的投稿都退了。《物理学报》登过此人的稿件,主编黄祖洽先生很认真,亲自核查,查出也有剽窃,黄先生公开在刊物上谴责⁴⁾。但我寄给《中国科学报》的郝柏林的信,却迟迟不见刊登。我把此事告诉了何祚庥先生,请他催促一下《中国科学报》。何先生一听此事,当即找了《中国科学报》主编,并亲自找到当时的科委主任宋健,要求一定要对这种恶劣行为公开揭露,而且还与中国科学报主编细致商量了公开揭露此事的细节。为了做到证据确凿,需要把《瑞士物理学报》和《数学物理》杂志的同一篇文章对照刊登。当时国内找不到《瑞士物理学报》,老何要我托人在美国找,正好我的朋友 Philip Candelas 在 CERN 访问,我请他用传真寄来了那篇文章。于是《中国科学报》于 1993 年 1 月 13 日第二版用大篇幅刊登了郝柏林来信、何祚庥的文章以及李富斌剽窃他人论文的证据,对违背科学道德的恶劣行为进行了一次大讨伐。公开揭露李富斌剽窃事件,老何确实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件事,大家都知道老何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公开反对“法轮功”,遭到“法轮功”信徒攻击。其实,在他发表文章之前之后,老何与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吹捧者、支持者们一直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说让有大科学家、大领导支持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自叹“有何祚庥在,我发不出功来”。对“法轮功”的危害,何祚庥先生曾多次给我谈过。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他考我“你知不知道一贯道?”由于从小关心国家大事,我的回答还是令他满意的。他进而给我分析对比了“一贯道”和“法轮功”对国家人民的危害,令人心服。我还知道,从国家利益和安全大局出发,老何曾直接写信给中央,表达自己对“法轮功”看法,提请中央尽快决策处理。他的这种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值得学习。

有人讥笑老何“作不了理论物理,才去多管闲事。”我有时候也想,老何是个理论物理学家,干吗做那么多不是自己专业的事?彭桓武先生去世前不久,曾经对我说过:“何祚庥做的一些事,比如关于

清洁能源,核能利用,其实都是理论物理的一部分,该叫个经济运筹学吧。那是要提出模型,统筹计算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英国,就搞过这类事。我设计了个模型,计算德国和英国空战时双方的损失,结果算出来德国飞机都打光了,英国还剩下几十架。Blackett⁵⁾为什么帮助我买船票回国?二战时他就是作军事运筹学的,他知道我做过这个事,才肯帮助我。所以,我看何祚庥做的这些事就是理论物理。”他的这番话,我觉得有道理。

近来读《钱三强传》,里面提到有关老何的一件事使我感动。1960 年 3 月钱三强访苏,当时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三个青年共产党员何祚庥、吕敏、周光召预感到中苏关系破裂后苏方必然撤退专家,我国战略武器研究将面临困难,主动找到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要求回国参加武器研究。由于他们报国心切,钱老爱才惜才,后来他们果然都参加了核武器研究,并作出了贡献。这件事使我领悟了何先生年轻时代为理想奋斗的执着。青年时期的何祚庥,老年时期的老何,看来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为理想而奋斗。因此我说老何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理论物理学家,不为过誉。

老何八十岁了,仍然奋斗不息,可钦可佩。正是:我敬何夫子,声名天下闻。一生有理想,奋斗永不停。

谨以这篇拙文向老何道一声迟到的生日快乐,并祝他和庆承瑞老师身体健康。

最后,特抄录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一段名言,与二位老师共勉:“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5) P. Blackett(1897—1974),英国物理学家,1948 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期领导了英国海军和空军的反潜艇、防空运筹学研究。1947 年底曾为彭先生弄到一张英国运兵船的船票,帮助彭先生回国。